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环球瞭望

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开幕在即，巴西却面临多重困难，政坛频繁更迭、奥运场馆建设拖沓、国内寨卡病毒肆虐、恐怖主义风险加大，这些问题都使巴西“未来之国”的现实之路面临重重考验。

巴西“未来之国”的现实之路

□ 靳呈伟

《巴西：未来之国》的作者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顺访巴西的年代，恰巧是巴西自主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年代。彼时起，围绕发展与提升国际地位的现代化目标，巴西努力使“未来之国”成为现实，在迈向大国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21世纪的头十年，巴西经济累计增长37.3%，GDP年均增长3.6%，人均GDP年增长率2.4%。巴西的经济排名也快速上升——2005、2006、2008、2011年分别为世界第十四、第九、第八、第六大经济体。金砖国家之一、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南北对话参与国、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三边委员会”成员、“四国集团”成员等彰显着巴西的国际地位。在各种关于软实力的考评体系中，巴西均交出不俗的答卷，在英国《单片眼镜》杂志“全球软实力测评报告”中，巴西2011、2012、2013年的全球软实力排名为第21位、第17位、第19位，在金砖国家中排名最高。一切都那么美好，“未来之国”成为现实似乎近在咫尺。希望通过联合会杯、世界杯、奥运会等窗口向全世界展现“不一样的巴西”的巴西政府可能没有预料到，剧情突然之间发生变化——经济低迷、腐败丑闻、政治僵局、社会动荡、寨卡病毒、奥运门票滞销，等等。“未来之国”怎么了？了解巴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条件、地缘环境等方面的一些情况，或许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看待相关问题。

政治领域，民主巩固和发展过程中遭遇困境

自上世纪80年代军政府还政于民以来，巴西的政治体制一直保持正常有序的运转，民主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但也存在政党虚弱、政党制度碎片化等问题。围绕总统弹劾案形成的政治僵局乃至政治危机将原来潜藏的一些问题放大，引发各界担忧。

经济领域，经济转型取得显著成绩，但尚未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上世纪中后叶的军政府时期，巴西即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用不到50年的时间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巴西经济转型进入一个关键期。通过以“雷亚尔计划”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巴西努力推动由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目前，巴西农业实现了多元化发展，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还是农产品和食品净出口国，是世界最大甘蔗、咖啡出口国；巴西工业是拉美地区最为发达的，在汽车、钢铁、航空等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巴西的服务业也较为成熟并且多样。巴西经济与国际贸易市场、金融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在过去的10年里，巴西注重与不同的国家、地区和贸易集团加强往来，发展不同的贸易伙伴。换句话说，巴西的国际经济布局是全球性的，呈现出发展中大国和发达国家并重、贸易布局覆盖全球的特征。巴西近几年的经济低迷，除了世界经济大环境方面的原因外，也折射出巴西自身经济领域的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巴西尚未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社会领域，微观社会得到发展的同时，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长期以来，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巴西。针对困扰巴西的社会顽疾，劳工党执政后采取了涉及就业、社会救援和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使发展成果得以较好地惠及民众，促进了微观社会的发展，其成效颇为显著——2003至2010年，巴西的家庭年均收入的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大约有4870万巴西人脱离贫困，半数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了68%，是金砖国家中财富分配做得最好的国家。但是情况的改善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两极分化及其附带问题依然是巴西需要面对的难题，解决不好会极大影响巴西社会的稳定性。2013年以来的各种社会抗议活动的根源还是在于巴西经济及社会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

文化领域，多样包容的文化传递着积极的国家形象

多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多民族大融合，使巴西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约瑟夫·奈2012年指出，如果观察巴西文化及其影响，会发现这个国家的形象本身就是积极的。多样包容的巴西文化向世界传递出积极的国家形象。



自然条件方面，优厚的自然条件使巴西经济的发展蕴含巨大潜力与无限可能

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其国土面积和人口均居世界第五位。“领土非常大，人口又非常多”的巴西拥有极为优厚的自然条件与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着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亚马逊热带雨林、最大的淡水库、丰富的矿产资源，等等。优厚的自然条件与丰富的自然资源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巴西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外贸产品结构）、巴西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初级产品出口国、“外围国家”昭示着巴西经济的脆弱性及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弱势地位。虽然经过努力，情况有所改观，但相关影响仍不容小觑。同时，优厚的自然条件与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巴西经济在不同时期取得较大成就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也使巴西经济的发展蕴含巨大潜力与无限可能。

地缘环境方面，相对和平的周边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空间。巴西是邻国较多的国家，与除厄瓜多尔、智利之外的所有南美洲国家都接壤。早在20世纪初，巴西即已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所有边界问题。而且，南美洲是一个地缘环境相对和平的大陆。在独立后近三百年的较长时段内，巴西甚少被卷入战争中。

国际领域，巴西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发生变化，国际影响也越来越大

经过上世纪末以来（特别是劳工党执政以来）努力减少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并扩大其积极效应的一套组合拳，巴西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发生变化，其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巴西政府作出决定，要以主要大国的身份融入全球事务……我们不愿意再按照以往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似乎我们是拉美的贫困小国，一个第三世界的小国……巴西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卢拉在2003年对巴西外交官的这段讲话颇能说明问题。

鉴于巴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条件、地缘环境等方面的情况，可以形成以下认识：上个世纪末尤其是21世纪以来，巴西总体上呈上行态势。让“未来之国”成为现实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巴西在迈向大国的道路上稳步向前。但巴西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问题与不足及国际风云的变幻，使巴西“未来之国”的现实之路面临重重考验，注定难以一帆风顺。有时会进入快车道，有时会步履蹒跚，甚至有时可能会陷入泥沼。巴西一位评论家曾断言，文化和人民是巴西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不论巴西经济和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如何变幻，它们都能泰然处之。“当我向全世界发出邀请，我要让你们看到我能行。欢呼，痛苦，微笑，尖叫。无论结果怎样，高擎旗帜，直破云天。”重温巴西世界杯主题曲，或许会发现，困难与考验对天性乐观的巴西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

西方社会

本土恐怖主义与美国反恐困境

□ 陈积敏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明确将本土恐怖主义列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一部分，这说明它已引起美国政府的警惕与重视。迄今为止，这种本土恐怖主义主要表现为“独狼式”袭击，它具有下述特点。一是难以监控。“9·11”后，美国大幅增强了边境与海关查验力度以及海外情报收集与处理能力，这有效阻绝了来自于国外的恐怖分子袭击，但对于由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在受到极端主义思想影响下而发动的恐怖袭击而言，这种做法显然并不奏效。二是攻击更易。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政府在对本国公民采取约束措施时面临不小的挑战。对于那些没有犯罪前科的潜在恐怖分子，美国的监控网络难以发挥功能。更重要的是，由于激进主义思想传播方式的多元化，美国政府想将那些受到极端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完全收罗到自己的监控网络中来其实也并不现实。另一方面也在于美国公民在获取枪支方面更为便捷。换言之，潜在恐怖分子完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得到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这为造成大规模血案提供了条件。

因此，面对本土恐怖主义袭击的迭次发生，美国的反恐战略需要做出深刻的反思与调整。简言之，美国需要一项综合性的安全战略来应对不断衍生的本土恐怖主义威胁。

首先，在社会安全方面，要再次明确严格枪支管控的重要性。当然，要实现在美国完全禁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对购枪者进行更严密的安全审查，包括精神状态的审查以及禁止出售攻击性武器等措施，还是可以做到的。

其次，要打破党派政治的局限，协调两党在控枪政策上的立场并采取果断行动。奥兰多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政治中的党派分歧再次凸显，民主党人强调其一贯的立场，即严格枪支管控措施，并试图推动国会立法，而共和党人仍然对此持反对立场。实际上，在今年年初，奥巴马总统因无法获得国会的支持而不得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推“限枪令”。从这个角度来说，受到党派利益绑架的美国政治在应对诸如枪支管控、移民政策改革等富有争议性的问题上很难有所作为。这不得不给外界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与党派利益相比，民众利益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再次，美国需要加强社会融合，促进各宗教、各族裔群体的团结。无论是去年底加州圣贝纳迪诺市的枪击事件，还是现今的奥兰多事件，案犯均受到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其穆斯林身份，从而使得美国民众将恐怖袭击与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尽管奥巴马总统十分慎重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讲话中拒绝使用“伊斯兰极端主义”或“激进伊斯兰主义”等词汇，以免引发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以及美国国内非穆斯林群体与穆斯林群体的紧张关系。但是，一些政治人物为了其政治利益需要却在不断渲染“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威胁，例如特朗普在枪击案发生之后表示，如果奥巴马不能明确使用“激进伊斯兰主义”这个词就应该辞职，如果希拉里不能使用就应该退选。这种“火上浇油”的做法有可能令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陷入紧张，也可能引发美国国内穆斯林群体的恐慌，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分裂。值得一提的是，从特朗普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语，其受众是十分明确的，就是美国选民。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如此行为，应该是充分考虑到在其受众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美国人认同其观点，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社会在恐怖威胁与穆斯林群体之间建构了某种联系。由此可见，此类恐怖袭击案展现出美国社会存在着被撕裂与分化的风险，从而增加了其社会与文化融合任务的紧迫性与艰巨性。

最后，美国应该调整与更新其内外反恐政策。从内部来说，美国应进一步完善其情报收集、分析与后续处理能力，这需要加强情报与安全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从外部来说，美国在反恐手段上应更加多元化，在运用“无人机”“特种作战”等方式打击恐怖主义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些措施的外溢效应。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需要将其反恐战略目标单一化、明确化，不应该在反恐问题上持有双重标准，对加强国际反恐合作设置不必要的障碍；不应该在“反恐”政策夹带“私货”，如打着“反恐”的旗号行“政权更迭”之实，否则，美国的反恐战略将会陷入在消灭一个对手的同时又增加一个新对手的困境。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被历史所证实。无论是“基地”组织，还是现在在叙利亚、伊拉克地区活动猖獗的“伊斯兰国”，其兴起背后都有美国因素的存在。可见，美国所面临的严峻反恐形势既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扩散化、极端主义思想传播多元化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美国所奉行的整体反恐战略与政策密切相关。这一点，美国政府应当有着清晰的认知。

根除恐怖主义重在推动国际反恐合作

□ 慕小明

法国尼斯恐袭案让全世界再次陷入恐怖主义的阴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期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联盟调整其反恐策略，加之中东重要域内国家不同程度地改变对恐怖势力的暧昧态度，国际反恐联盟加大军事打击恐怖主义力度，近来国际反恐战场取得重大进展。塔利班首领曼苏尔被美军定点清除、“博科圣地”日见式微、军事打击盘踞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取得重大进展。在叙利亚、伊拉克、尼日利亚等地，恐怖势力不仅难以实施大规模武装“割据”，而且生存空间大大压缩，甚至可能面临毁灭性打击。

就在人们为反恐战场捷报频传而欢欣鼓舞之时，世界各地恐袭案频发再次警醒世人：单纯依赖军事手段反恐并不能带来国家的重建和正常社会生态的恢复，并有可能造成恐怖势力回流母国，形成新的恐怖袭击策源地，国际反恐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军事化反恐作用有限

事实证明，一味迷信武力反恐，只会落得“士卒凋瘁，寇不为衰”的境地。“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东和非洲的军事化反恐手段不仅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反而对当前恐怖主义在中东和非洲的泛滥成灾负有很大责任。奥巴马上台后，积极谋求从全球反恐的两个主战场——伊拉克和阿富汗抽身。然而，美军离开伊拉克不到两年，“伊斯兰国”便迅速崛起，一度兵临巴格达城下，着实令奥巴马政府猝不及防。正是在美国及其反恐盟友在非洲的穷追猛打中，“博科圣地”和“索马里青年党”成长为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并展开更为猛烈的报复行动。据英国梅波克洛夫风险评估公司统计，“博科圣地”已经成为全球最致命的恐怖组织（平均每发起一次袭击，就会造成24人丧生）。马里恐怖袭击表明，非洲萨赫勒地带的反恐形势依旧不容乐观。目前“博科圣地”正化整为零，其武装人员向尼日利亚、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等多国扩散。6月初以来，“博科圣地”在乍得湖地区接连发动袭击，并一度攻占尼日尔东南部博索镇，造成当地重大人员伤亡，5万名当地居民逃离家园，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在喀麦隆极北大区，“博科圣地”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再度猖獗。

“博科圣地”的兴起与区域内国家治理不善有着很大的关系。长期的政治腐败、社会不公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匮乏，加深了社会矛盾和族群冲突。因此，从军事上打败恐怖主义仅仅是第一步，尽快提升区域内国家的治理水平才是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本之道。消除恐怖主义，不仅要消灭恐怖分子，更要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社会土壤，如果强权政治不除、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不能建立、社会腐败未得治理、贫富分化不得限制，则恐怖主义产生的隐患就会永远存在。

军事化反恐造成恐怖势力化整为零

就目前而言，叙利亚问题是解决“伊斯兰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即使国际反恐联盟击溃了活跃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势力，也谈不上完全根除了“伊斯兰国”。因为这些被击溃的“伊斯兰国”势力完全有可能化整为零，转移到利比亚、也门等其他动荡地区活动。事实上，无论是在利比亚、也门、突尼斯，还是在埃及、约旦等地，近年来也都发现了“伊斯兰国”势力活动的踪迹。“伊斯兰国”目前在40多个国家拥有分支或者松散的下属组织，并具备向全球各地拓展和扩散组织的网络，从而有可能出现新的动荡地带。尽管“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与叙利亚受到重创，但该组织对全球所构成的威胁依然严峻，且持续复杂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向安理会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伊斯兰国”近日在伊叙境内的势力范围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其战斗力未见减弱，它的武器与弹药供应也未曾出现短缺。“伊斯兰国”很可能加速把资金转移到战区外的恐怖组织分支。当前，恐怖主义的国际化、本土化趋势相互交织，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从“博科圣地”到“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形成恐怖主义在地区乃至全球层面的“联动”与“共振”，加强国际反恐合作迫在眉睫。

军事化反恐引发国际恐怖势力重组

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事平息以后，将掀起新一轮国际恐怖分子的全球回流潮，国际社会还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恐怖分子回流问题。据统计，2012年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外国“圣战”分子只有约3500名，如今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25000名。这些武装分子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周边突尼斯、沙特、约旦、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的极端分子，也有为数众多来自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极端分子。他们不仅认同“伊斯兰国”所宣扬的极端意识形态，而且在叙伊战场上接受了各种军事技能训练，有可能引发国际恐怖势力重组，从而掀起新的恐怖活动浪潮。这不仅会对国际安全形势形成新的挑战，也会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稳定构成新的威胁。因此，各国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打击恐怖分子回流母国的通道，遏制恐怖分子回流势头。



▶2016年7月14日，法国尼斯遭受恐怖袭击

恐怖主义既是动乱之源，也是发展不足的恶果。当前国际反恐行动中过度依赖军事化反恐手段，一些国家甚至将恐怖主义根源归咎为“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仇视，一意孤行推广所谓“普世价值观”和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发展模式，加剧了冲突的烈度。然而，恐怖主义兴起并非缘于不同文明间存在的差异，而是全球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悬殊、全球治理包容性不足、霸权主义逻辑盛行等因素所致。事实证明，实现全球发展的平衡和综合国家治理才是反恐的治本之策。

战略视角